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宗教对话与比较研究丛书

ZONGJIAO DUIHUA YU

BIJIAO YANJIU CONGSHU

姜燕
著

理雅各《诗经》翻译
与儒教阐释

山东大学出版社

宗教对话与比较研究丛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4JJD730001)

理雅各《诗经》翻译与儒教阐释

James Legge's Translation of *Shijing* and
Interpretation on Confucianism

姜 燕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雅各《诗经》翻译与儒教阐释/姜燕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607-4966-2

I. ①理… II. ①姜… III. ①《诗经》—英语—文学翻译—研究 IV. ①I207.22②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2940 号



责任策划:刘森文

责任编辑:王 潇 刘森文

封面设计:牛 钧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济南景升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3.75 印张 232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序

姜燕的博士学位论文经修改即将出版,邀我作序。论文选题是理雅各的《诗经》译本,属文献学典籍翻译方向。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领域,而我,既不懂文献学,也不懂典籍翻译,照理应予婉拒。可是,姜燕是我的学生,学生请老师作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没有理由予以谢绝。可是写什么呢?虽说序言的内容可以活泼多样,但总不能尽说些与主题或专业无关的东西,这样看来,这个序言肯定乏善可陈了。

理雅各(1815~1897)的汉典英译一向名重学林。但翻译是极难的事情,它需要译者至少具备两方面素养:一是语言素养。无论汉译英还是英译汉,缺乏必要的功力都将一事无成。严复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其中“达、雅”即指译者的语言修养和翻译技巧。事实上,目前翻译领域形形色色的劣质译作,很多都是由于“达、雅”不至而造成的。二是专业素养。依我们理解,严复的“信”并非仅就译者的语言能力而言,而更多应指专业素养。这是每位译者都必然遇到的问题,也是决定翻译质量的重要环节。实际上,“达”与“雅”不只是针对翻译质量的要求,只要写作著文,都必然遇到这些问题。而“信”,则专就翻译而言,要求译者不仅有良好的语言功力,而且有深厚的专业素养。理雅各无疑具备了达至“达、雅”的最优条件。他的母语能力自不必论,即使是复杂难学、已经死去的古典语言,也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训练。而他在华30年,交游士林,徜徉翰墨,终日与古典文献相伴,无疑也获得了坚实的古代汉语基础和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这样的条件,是常人难以具备的。所以在庞大的来华传教士群体中,他博览群籍,著作等身,成为无可争议的一代翘楚。他翻译的《中国经典》和《东方圣书》中的许多篇章,在众多的译本中也自然成为标准版本,一向为学林叹服称颂。那么,理雅各的译作是否也达到了“信”的目标或境界了呢?

作者通过大量材料证实,他的人格和思想其实是呈现了矛盾的两面性。他承载着基督教的上帝之爱前来“蛮夷”之国实施“救赎”,他的宗教情怀以及他所秉承的教化理念无疑包含了“救世”的真诚和善意,因而他对香港乃至内陆的文

化、教育、赈灾、救灾、戒烟、戒赌等公益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同时又带着宗主国的立场从事他所钟情的传教事业，不时以民族主义意识介入或现身殖民地事务。在汉典英译过程中，他常常先入为主，矢志搜寻甚至附会那些既定使命下所需要的材料，竭力注入基督教因素。而当涉及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时，他又时时以宗主国的尺度比照他的研究对象，继而满怀希望预测这个“天朝帝国”的覆亡或终结，以期建立基督教的一统天下。但是学术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忌以感情用事，而翻译是学术研究的重要门类^①，如果翻译过程介入了太多的情感因素，翻译的成果必然失于客观，疏离真实。这样的译文显然难以见容于真正的学术了。

这里不去过多涉及理雅各的宗教和政治思想如何在他的译著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记，而只拟就某些概念的译法作一讨论。中国封建主义或封建社会是理雅各译文所致力的重要文化现象，也是他著述中的重要学术概念。在理雅各看来，中国历史经过了漫长的封建时代，从大禹以迄两周，历时 2000 年之久。由于天子封邦建国，诸侯峰起，国土分裂，天下纷争，王公与天子分庭抗礼，甚至“挟天子以令诸侯”。在理雅各的印象里，这很像欧洲 Feudal Society 的景观。作为博览群书的杰出学者，他对欧洲 Feudal Society 的历史与文化无疑有一定了解和认识。而 Feudal Society 结束后，经文艺复兴的起始和启蒙运动的奠基，至理雅各生活的时代，Feudalism 研究已经成为欧洲学术界的显学，不仅形成了许多具有学术传统和重要影响的学术派别，而且建构了系统的思想、理论、方法和体系。生当这样的时代，即使不去专门研究封建社会的历史与文化，对于当代学术也不会无所知晓，何况他的翻译工作时常涉及，因而必须查阅封建社会的相关著述和知识。但是，我们又不能因此而过高估计他的专业素养，因为他毕竟不是专业研究人员，这决定了他理解和认识的限度。正是由于对本土历史文化以及相关学术史有一定了解和认识，理雅各的观念里形成了他自己关于 Feudalism 的模板，以至于遇到中国古典文献中的“封建”，即产生对译的冲动，遂有了中国 Feudal Society 之说。但是，也正是由于他对本土历史文化及其学术史有一定了解，而这种了解又不够具体、不够深入，理雅各的认识停留在了本土 Feudalism 和中国封建社会的表象，关于反映二者本质特征的差异，也就难以达到应有的深度。这决定了理雅各译文的“信”只能达到一定的度，而这种度或低于学术界对他的估计和评价。这里有专业的局限，也有时代的局限。

与西欧不同，中国的分封贯彻血缘原则，即所谓“封建亲戚，以屏周室”。周

^① 在中国当代学术界，对于非外语专业的学者来说，翻译不算成果。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错误认识。在很多情况下，当我们以严复的“信”来衡量翻译作品的时候，它们的学术含量并不低于有时甚至高于一些专业研究成果。如果以这样的认识衡量严复，慢说不能做北京大学的校长，即使是讲师，恐也难说称职了。

初分封 71 国,而姬姓独居 53 人,这样的分封显然是血缘关系的产物。而血缘分封的结果,必然是宗法制的建立和“家天下”的形成。欧洲 Feudal Society 的分封虽非全然没有宗法因素,但受封诸侯绝大多数为从军将士,与国王并无血缘关系,自然难以形成“家天下”的格局。贵族的最高利益与王权自有一致性,却也形成了独立的政治力量,《大宪章》的诞生以及《大宪章确认令》的颁行,正是这支力量独立而且强大的证明。国王征收赋税,必须与纳税人协商,由此形成了“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共同同意”的赋税基本理论。而控制了税权,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王权。议会的产生更意味着对王权的侵占和分割,至中世纪后期,除了执掌税权外,议会还获得了立法、司法等权力,这是分权的结果,也是制衡的证明。而基督教,自始即作为王权的异己力量引进罗马,虽不否认在一定条件下与王权形成合作并提供支持,但它从来都认为王权得自上帝,分自教会,因此必须依从教皇。所谓欧洲中世纪二元政体,正是对教权与王权二元对立而前者对后者形成有力牵制的富于见地的表述或说明。这些现象,不见于中国古代政治,隶属于欧洲封建制度的更深层次,也正是问题的本质所在。既属问题的本质,便不宜将中国古代的封建与西方中世纪的 Feudalism 对译。而未及问题的本质,译文的“信”自然要黯然失色了。

有意思的是,在西学东渐的编年里,在理雅各人生阶段的后期,中国也诞生了自己的杰出翻译家,他就是清末著名维新派人物、启蒙思想家、教育家严复(1854~1921)。严复晚生理雅各 40 年,将他视为与理雅各失之交臂的同代人可谓差强人意。当理雅各完成了他在香港的使命回国继续从事中国经典翻译的时候,严复也来到朴茨茅斯大学留学,后又转入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1877~1879 年)。留学期间,他大量涉猎西方政治学著述,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两人的人生阅历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理雅各的使命是传教,后来却成为著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严复本为官派留学学习海军技术,却也成为西学家和翻译家。理雅各具有汉典英译的优良条件,翻译中国古典名著且著作等身,后受聘牛津大学教授;严复同样具有英籍汉译的优良条件,大量翻译英文著述,后受任北京大学校长。相似的人生阅历和命运使两人都成为译界泰斗,并同在封建制度或封建主义这个译点上因专业修养问题而留下了遗憾。

严复的译著,有许多涉及封建概念和封建社会问题。在这些译著中,英国学者甄克斯的《政治史》(E. Jenks, *A History of Politics*)对他的思想影响尤深。甄克斯的《政治史》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表作,它将人类社会的进化概括为蛮夷或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和国家社会三个阶段,将 Feudalism 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介于宗法社会与国家社会之间。在严复看来,甄克斯的社会发展图式很具说服力,因此以之衡量中国历史进程,以与理雅各相对的身份解读西周的封建现象,认为中国从尧舜以迄周代,宗法制度最为完备,视为封建之制当无疑义。此后到他生活的时代,宗法色彩稍损,但仍可称为封建之制。他

以古代汉语中的“封建”对译 Feudalism, 与理雅各可谓异曲同工。但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封建”具有特定的内涵,主要指西周分封制,而如前所论,西周分封与西欧分封存在重大差别,严复翻译这部著作(取名《社会通论》,商务印书馆 1904 年版)时未加比较区别就进行了对译,这就必然影响译文的“信”度。严复的国学基础是毋庸置疑的,但在中国当时开放还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西学基础则很难说深厚、坚实。所以严复的翻译问题,仍然是专业修养问题。

这样,在理雅各和严复的笔下,欧洲和中国便有了相同的封建主义或封建社会。但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也远没有这样简单。进入 20 世纪,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这些译文进一步发生作用,直接影响了新中国政治理论基础的建构,以致在今天,关于封建制、奴隶制问题,关于五种生产方式问题,仍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翻译的作用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由理雅各的译著转而审视作者的论文,我们看到,作者通过对三个译本的比较研究,挖掘了影响译本变化的诸多因素,重点揭示、梳理了译者的思想脉络和心路历程。这样的研究,使论文避免了流于文献学和普通翻译专业研究的常套,具有一定的新意。这并非说文献学和普通翻译研究就没有创新、不可以创新,只是说作者的思路和设计具有另辟蹊径的意义。而综观论文的全貌可见,作者在全面收集理雅各译著及其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严整的逻辑框架,这个框架从译者的家庭教育和时代背景切入,剖析译本的内容并比较它们的异同,最后以译者的宗教、政治、学术思想作结,思路清晰,主次分明,评价公允,论证周全,读后,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汉典翻译研究是一方开发不久、大有可为的学术园地,它以浓郁的历史、哲学、文化气息赢得了学术界的青睐,吸引着学者们的兴趣。尤其是青年学者,风华正茂,思想活跃,敏于探求,富于创造,在这里成就自己的事业,无疑是一个理想的场所。祝贺姜燕的博士论文出版,更期待她的新著问世。

顾奎斋

2013 年 11 月

前 言

随着国外汉学研究的深入和国内对传教士翻译的重视, 各界学者对理雅各及其《诗经》译本的关注和研究日益增多, 但对三个译本皆进行研究者较少, 而本书采用权力关系翻译理论作为理论框架, 对其三译本进行比较研究更是一种新的尝试。全球化语境下, 文化的差异并没有也不可能被抹杀, 而是愈发凸显其民族性。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 翻译活动仍须应对复杂的翻译关系, 而中国传统典籍翻译涉及不同历史语境、文化语境, 更要力求实现跨越时空的译者主体意识和原作者主体意识之间的融合、译入语文化和源语文化之间的对话。因此, 本书对从事中国传统典籍翻译的实践和研究将会是有益的探索。

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被誉为 19 世纪西方汉学界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儒学专家。他出生于苏格兰, 1839 年, 接受伦敦会派遣到马六甲一带传教; 1843 年, 任英华书院校长的理雅各随书院迁至香港, 开始其三十余年的殖民地生活, 并对中国传统典籍进行译介。19 世纪英国的时代特征、理雅各的童年经历、教育背景和传教工作造就了他独特的学术气质。

理雅各系统研究和翻译了中国儒家典籍, 对中国道家哲学和佛教经典也有所译介, 并有独到的见解。理雅各三译《诗经》, 每版均有其鲜明的特点。本书采用的权力关系翻译理论既强调译者主体性, 同时, 又认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本书在这一理论框架下, 从理雅各不同译本的细读分析出发, 结合译本形成的真实历史和文化语境, 揭示译本变化所体现的译者思想历程。

理雅各的 1871 年《诗经》译本以其厚重的学术性翻译而成为西方汉学界的标准译本。他秉承了当年耶稣会士索隐式研究中国儒家经典的模式, 但对待中国经典和文化的态度却又继承了先前新教传教士的翻译传统。受原著权威的制约, 该译本进行了逐字逐句的翻译, 并包括近 200 页的译序, 汉语原文和注释均同步出现在译本正文中, 另有汉语专有名词附录, 最后还附有索引。在该版本中, 译者对准确性的苛求胜过对审美的关注, 并将中国传统注评置于权威地位。但这种异化的翻译方法也夹杂了归化的成分, 译者在译本中掺入了许多关

于中国政治、社会、宗教、文化等方面的阐释和批评,反映了译者服务于基督教传教事业和本国政治利益的翻译宗旨。

在该《诗经》译本中,理雅各以其西方价值观批评了孔子和儒家经典,斥责了中国的一夫多妻制。理雅各汉学研究的初衷是在中国经典著作中寻找基督教的 God,从而为传播基督教提供理论支持。在《诗经》译本中,他更坚信,中国古代已有大量关于基督教最高神 God 的知识。按照他的基督教思维,理雅各把中国人信奉“上帝”看作是宗教信仰,而把拜神和祭祖视为迷信。在“上帝”的概念上理雅各继续他对孔子的批评,他认为,《诗经》里多次出现的“帝”和“上帝”的概念具有人格神的特点,能够统治天地,决定人的道德本性,统领各个民族,而孔子却更乐于使用“天”(理译为 Heaven)的概念,在整部《论语》中,没有一处提及具有人格特点的“帝”或“上帝”。他指出,孔子对宗教的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后世中国人的宗教观,以致形成了中国人的无神论,使中世纪和现代的中国人很难接受基督教的上帝。在他看来,中国人是否了解 God 的本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要接受 God 的启示,并最终接受基督教。理雅各讽刺夏、商、周三代封建制度,而他对封建制度的否定则旨在诋毁孔子,赞颂秦始皇推翻封建王朝、建立持续至清代的现代专制制度。理雅各赞扬秦是由于它的革命性,并且也期待中国出现另一场革命。按照理雅各对秦革命性的界定,第一次鸦片战争便也成为一场革命,是一场帮助中国改革旧制、摆脱落后愚昧、走向新生活的革命。于是,他顺理成章地为鸦片战争找到了必然和正义的理由。

在 1871 年的翻译版本中,理雅各认为《诗经》本身的价值不值得费精力将其译为韵体,但西方读者对于这部古典东方名著的译本有着更多语言和文体方面的期待。他们的这种期待既源于西方诗学传统,又来自《诗经》原文本身的语言特点。并且,之后几年中的经历也促使理雅各逐渐改变了对《诗经》价值的认识。回国前,他去中国北方进行了一次旅行,他到了北京天坛,到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圣山——泰山和曲阜孔林中的孔子墓。理雅各回国前的中国北方之行可以看作是他对孔子态度逐渐转变的重要标志,而对孔子的态度直接关系到他对儒家经典著作的看法。这些因素促成了理雅各 1876 年韵体《诗经》的诞生。回国后,理雅各汉学家身份的自我意识变得越来越清晰,对中国文化也变得较为友好。而在理雅各的这一思想转变过程中,穆勒的比较宗教思想也起着不容忽视的引导作用。

1876 年的韵体版《诗经》不再像 1871 年版那样只苛求精确,而是以读者的预期为中心,在力求准确的同时更注重审美诉求。为吸引多层次的读者,韵体《诗经》减少了注评,且注评中没有了汉字,汉语原文也被删去。和 1871 年版比较,1876 年的韵体译本不仅体裁上有所不同,语言风格和版本编排形式也均有很大改变。该译本强调押韵,但忽略了英语语言的规范化,因此,第一版之后便没有再版。在该译本中,译者加强了独立的翻译阐释,同 1871 年版本相比,该

译本的宗教和政治倾向得以弱化,体现了译者的人文关怀。

在1876年《诗经》译本中,译者增强的独立阐释能力在注释中可见一斑,尤其反映在隐喻的使用和译文中附加其他内容的翻译方式上。在注释中,理雅各使读者对其他注评家的观点产生质疑,同时把自己的观点介绍给读者,如此,译者同时充当了原文本及解经传统的阐释者。理雅各在正文的翻译中加入了很多原文之外的内容,大量附加内容的掺入难免使原诗失去本来面目,实际展现出的是按照译者的想象来塑造,添加了大量译者思想的新形象。理雅各坚持“上帝”即为God的立场,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试图将典籍中所出现的“上帝”、“帝”全都译为“God”。但在该译本中,随着初步接触穆勒的比较宗教思想,理雅各的宗教观念更加开放,心态也更为平和。在“上帝”以被褻渎的方式出现的诗歌中,1876年版就采用了更为平和的语气,有时也根据原文的真实含义不再译为“God”,而改译为其他,如译为“the king”。同时,1876年韵体版少了前版凝重的宗教、政治气氛,诗歌中人物的塑造更加生动,语言更轻松流畅。

1876年10月,理雅各来到牛津大学这一古老的学术圣地,开始了他的汉学教授身份和第二次职业生涯。理雅各深受穆勒的影响,1879年《诗经》译本体现了译者的比较宗教观念。1879年《东方圣书》第三卷中的《诗经》译本,无论从译文和注释还是从前言和绪论,都与先前有明显的不同,译者注重翻译,但更注重阐释。作为汉学教授、比较宗教学家的身份变化影响着理雅各对中国传统经典的翻译和阐释,他似乎在有意识地增强其学者身份的认同,强调其不仅是译者,更是阐释者。受穆勒比较宗教思想的影响,理雅各的中国宗教观也已发生了极大变化。

1879版《诗经》弥漫着浓厚的比较宗教意味,理雅各在有意强调甚至挖掘原诗的宗教意味,以期符合“圣书”的要求。而他改变《诗经》中诗篇排列顺序的目的也并不在于有意抗拒孔子的权威,而是以此方式展示自己的阐释。译者已把包括《诗经》在内的古代儒家经典视为真正的圣书,他现在的观点更科学,更比较。他认为,中国的圣书表明了儒教的历史发展进程,书中的宗教礼仪和孝道具有重要的道德、社会、宗教意义。

在三个《诗经》版本中,理雅各对孔子、中国经典及中国宗教的看法逐渐改变,显在的政治倾向在逐渐淡化,译者学术思想日益成熟和独立。1871年《中国经典》版《诗经》译本,以对孔子、儒家经典和中国社会、文化进行批评的直接方式来解构儒教,试图以基督教取而代之,是一种典型的殖民主义者的做法。后两版中,受读者批评、译者社会角色以及穆勒比较宗教思想的影响,理雅各对孔子和中国社会及文化不再肆意指责,而是逐渐采用了更为温和的方式去理解和同情中国宗教;对中国经典不再是挑剔批评,而是试图客观地展示,是一种具有比较宗教思想的东方学。但是这种比较理论只是为了避免直接的冲突,他仍要使东方接受基督教和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翻译演变为学术的东方主义。

翻译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相互沟通理解的重要方式,而在东西方的这一交流进程中,译者成为真正的文化中介。怎样协调二者的关系才能既体现原著和源语文化的价值,又能将源语文化融于目的语文化之中,显得尤为重要。各民族的文化各有特色,但无优劣之分,全球化的今天,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越发鲜明,通过翻译向西方读者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仍非常必要。翻译既是文本的翻译,更是思想和文化的翻译。译著不应抱有敌视原著和源语文化的目光,而应是同情和理解,但这种同情和理解不应是持高高在上的姿态,而应是以对话的方式。这种对话也不应由西方文化单方操纵,而是各方平等进行。因此,翻译应是译者对原著和源语文化的理解、接受和欣赏,并通过译著与目的语读者分享。

姜燕

2013年10月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理雅各及其对中国传统典籍的译介	(9)
第一节 时代特征	(9)
第二节 童年经历及教育背景	(13)
第三节 传教生涯	(17)
第四节 翻译事业	(19)
第二章 《中国经典》(第一版)中的《诗经》译本(1871 年)	(23)
第一节 译本形成的制控因素	(23)
第二节 异化与归化杂合的翻译策略	(37)
第三节 对中国文化形象的描绘	(52)
第三章 韵体《诗经》译本(1876 年)	(89)
第一节 译本形成的制约因素	(89)
第二节 归化翻译策略	(99)
第三节 译本的思想内涵	(111)
第四章 《东方圣书》中的《诗经》译本(1879 年)	(136)
第一节 译本形成的影响因素	(136)
第二节 以比较宗教思想为旨归的学术翻译策略	(145)
第三节 译者主体意识的彰显	(148)
第五章 《诗经》三译本所体现的译者思想脉络	(164)
第一节 宗教思想	(164)

第二节 政治倾向	(169)
第三节 学术思想	(171)
结 语	(177)
附录 基督教视域中的儒家宗教性 ——理雅各对《诗》《书》宗教意义的认识	(182)
参考文献	(194)
后 记	(205)

导 论

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被称为 19 世纪西方汉学界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儒学专家。他出生于苏格兰,先后在阿伯丁大学、海伯里神学院学习。1839 年,接受伦敦会派遣到海外传教。1840 年抵达马六甲开始传教工作,并于 1841 年接任英华书院校长。1843 年,即《南京条约》签订的第二年,伦敦会决定将其传教影响扩大至刚刚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理雅各随英华书院迁至香港,开始其三十余年的殖民地生活。

理雅各和大多数基督教传教士一样具有执着的宗教信仰和坚韧的传教信念。同时他又秉承了先辈的传统,即学习和研究目标传教民族的语言、文化,并对其传统典籍进行译介。

理雅各系统翻译和研究了中国儒家典籍,对中国道家哲学和佛教经典也有所译介,并有独到的见解。早在 1841 年,他就编写了《英、汉及马来语词典》,成为马六甲英华书院的教材。1852 年,在香港出版了《中国人的鬼神观》,对中国宗教进行研究。1861~1872 年间《中国经典》(五卷)第一版在香港出版,含全译英文本《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尚书》、《竹书纪年》、《诗经》、《春秋》与《左传》。1873 年理雅各回国。1876 年,理译韵体《诗经》在英国出版。1879 年,理雅各译出由穆勒主编的《东方圣书》系列译著的第三卷,含《书经》、《诗经的宗教内容》和《孝经》。之后,译出第十六卷《易经》。1885 年,已 70 岁高龄的理雅各译出《东方圣书》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卷《礼记》。1886 年,译出《法显游记》(又称《佛国记》)。1891 年,译《东方圣书》第三十九、第四十卷《道德经》与《庄子文集》。1893~1895 年,理雅各的《中国经典》修订版出版。另外,理雅各还发表了大量的有关中国文化研究的论文。

如此巨大的译介活动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但也给理雅各带来颇为丰厚的收获。1853 年,理雅各进入香港殖民政府教育委员会;1860 年,他提出了著名的“教育革新计划”;1875 年,获首届儒莲中国文学国际奖;1876 年,理雅各

任牛津大学首席汉学教授。

一、学术史梳理与研究现状述评

(一)国内外学者对理雅各的研究

因为《中国经典》，时至今日理雅各的影响在西方汉学界仍备受瞩目。他的女儿海伦(Helen Edith Legge)早在1905年就出版了传记《传教士学者理雅各》(*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该传记虽然对其汉学方面的成就着墨不多，但也记录了理雅各的传奇一生。然而在20世纪绝大部分的时间里，理雅各的经历和学术研究成果却并不为太多的人所知，直到80年代以后，这位成绩卓著的汉学家才逐渐吸引了国内外学者探求的目光。学者们开始从不同的领域、以多样的视角来研究这位传教士汉学家的生平、宗教学术、译著及教育贡献，甚至还研究他创办报刊以及其与华人的交往经历等等。

在研究理雅各的学者中，最为执着、成果最卓著者当属香港浸会大学宗哲系的费乐仁(Lauren Pfister)先生。从1986年开始，在经历了十几年的——《为了人生的职责：苏格兰新教传教士遭遇中国》(*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 James Legge and the Scottish Protestant Encounter with China*)潜心研究并发表30余篇的学术论文之后，关于理雅各研究的专著终于在2004年同读者见面，这部上下两册的专著记述了理雅各从出生到1873年离开香港近六十年的人生历程，并从独特的哲学视角着重对其1840~1873年间的宗教倾向和学术成就作了分析和评价。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勒亥大学(Lehigh University, Pennsylvania, USA)的诺曼·吉拉多特(Norman J. Girardot)完成的专著《中国文献的维多利亚式翻译——理雅各东方朝圣之行》(*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着墨于理雅各在牛津大学的执教经历。与费乐仁的研究方法不同，吉拉多特更多地关注作为学者的理雅各的困境。

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黄文江的专著《理雅各：中西十字路口的先锋》(*James Legge: A Pioneer at Crossroads of East and West*)和《传教使命、中国文化与殖民统治：19世纪理雅各与欧德理在港活动研究》(*Christian Mission, Chinese Culture and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A Study of the Activities of James Legge and Ernest John Eitel in Nineteenth Century Hong Kong*)记述了理雅各在香港殖民政府参与的各项活动，探讨了他与殖民统治的关系。

还有的学者从不同领域和视角对理雅各进行了研究。岳峰的专著《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采用解读法、综合分析法等多种方法，多角度、跨学科地对理雅各进行了全面研究。专著包括理雅各的在华经历和与

华人交友、创办报刊、教育改革及牛津执教,并对理雅各翻译的经书进行了语言学的翻译研究。

王辉于2007年1月在香港浸会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后殖民视域下的理雅各〈中庸〉两英译本》(*A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on James Legge's Confucian Translation: Focusing on His Two Versions of the Zhongyong*, Ph. D. dissertation, 2007),他从赛以德的东方主义阐述出发,将后殖民翻译理论应用到理雅各的翻译研究中。通过分析1861和1885年的两个《中庸》译本,王辉批评了理雅各的东方主义翻译,并将理雅各的东方主义翻译分为“1861年时的传教士东方主义”和“1885年时的学院式东方主义”;同时也指出:后殖民翻译是解构殖民主义的重要工具,后殖民译者迫切需要思考文化再现中的翻译责任和道德问题。

(二)国内外学者对理雅各《诗经》译本的研究

香港浸会大学宗哲系的费乐仁教授对理雅各的三个《诗经》译本均有论及,其《理雅各的韵体〈诗经〉译本》(*James Legge's Metrical "Book of Poetry"*)一文讨论了理雅各韵体《诗经》译本的形式、风格、韵律和技巧等,并与1871年版本作了比较,指出1871年版本是为了吸引学术关注,1876年版本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还简单介绍了1879年版本。费乐仁先生在其专著中兼顾了理雅各所翻译的三个《诗经》版本,着重对韵体译本进行了语言文学视角的分析,并对译者的传教士身份、宗教观念、哲学观点对翻译过程和译本形成的影响发表了独到的见解。

台湾学者张上冠对理雅各的《诗经》译本进行了评论和分析。其专著《消失的地平线:〈诗经〉英译研究》(*The Lost Horizon: A Study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hijing*)对理雅各、韦利、高本汉的《诗经》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从声音、形式、意义、名物、虚词、句法、时态、叙事角度等八个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他认为理译《诗经》遵从汉宋经学传统,在汉宋传统间进行了调和与选择。其论文《传统的翻译:理雅各以意逆志的诗经英译》认为理译属传统的翻译,对理雅各及其《诗经》英译本均给予很高的评价。张上冠的研究较有深度,但只是着重分析了理雅各《中国经典》系列的《诗经》译本,并忽略了译本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以及译者主观价值取向对翻译过程的影响。

岳峰对理雅各的《诗经》译本也有所分析和论述。其专著《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从语言学角度分析了理雅各的前两个《诗经》译本,并与詹宁斯、汪榕培、许渊冲等人的译本作了简单的比较。但由于不是对理雅各《诗经》英译本的专门研究,其分析自然粗略概括。

许渊冲、汪榕培在各自的《诗经》英译本前言,马祖毅的《汉籍外译史》,王辉

的文章《理雅各英译儒经的特色与得失》，胡先媛的《先民的歌唱——〈诗经〉》以及包延新的《〈诗经〉英译概述》，对理译《诗经》均有简单的介绍，但都不是专门的译本研究。

另外，闫晓喆的硕士论文《〈诗经〉四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陈宏川的硕士论文《论〈诗经〉在英美的翻译和接受》等，对理雅各的《诗经》译本作了分析，但都有一定的舛误，比如对理雅各的中英文名字理解有误，对译本出版时间的考察不够准确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外对理雅各及其《诗经》译本的论述虽多，但对其《诗经》译本的专门研究尚为不足，对理雅各的三个《诗经》译本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者更是少之又少。

二、资料占有

本书使用的资料有以下几方面：(1)理雅各的著述；(2)国内外学者关于理雅各的研究成果；(3)理雅各时期的报刊；(4)国内外翻译理论方面的有关著述。

理雅各的著述主要包括：《中国经典》系列译著(*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中的第一卷《论语》、《大学》和《中庸》，第二卷《孟子》，第三卷《尚书》，第四卷《诗经》，第五卷《春秋》、《左传》；理雅各的韵体《诗经》；《东方圣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系列译著中的第三卷《书经》、《诗经的宗教内容》和《孝经》，第十六卷《易经》，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卷《礼记》，第三十九、第四十卷《道德经》和《庄子文集》；理雅各有关宗教和学术方面的论文：*The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 Spirits*；*Confucianism in Relation to Christianity*；*The Religions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Described and Compared with Christianity*；*The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s and Spirits*。

国内外学者关于理雅各的研究成果包括：理雅各的女儿海伦(Helen Edith Legge)出版的传记《传教士学者理雅各》(*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费乐仁(Lauren F. Pfister)的著作《为了人生的职责：苏格兰新教传教士遭遇中国》(*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 James Legge and the Scottish Protestant Encounter with China*)以及数篇论文；诺曼·吉拉多特(Norman J. Girardot)完成的专著《中国文献的维多利亚式翻译——理雅各东方朝圣之行》(*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及相关论文。